

八十年代中共的知識分子政策

周玉山

一、中共知識分子政策的張本

知識分子接近中國古謂之士或儒，不但是社會的良心，而且是平民的導師，如韋伯所說：「中國儒者雖由禮義訓練而成，實由對俗界士君子的教育而來①。」中國知識分子由於最早從宗教中解脫，又多來自民間，因此若和西方相較，尤具人文精神與平民性格。不僅如此，他們每以國家興亡為己任，孔子主張的「見危授命」，曾子期許的「任重而道遠」，孟子強調的「威武不能屈」，以及禮記所載的「戴仁抱義，雖有暴政，不更其所」等，都有無數的知識分子身體力行，而為青史留名，遠之東漢太學生請願，近之五四運動，皆為顯例。

從馬克思到鄧小平，都有敵視知識分子的紀錄。馬克思本人雖為一介書生，但在論及剩餘價值時，貶抑精神勞動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又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斷言，只有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時，才開始真正的分工。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則指出，精神勞動者逐漸形成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為了

自己的利益，永不錯過機會，把越來越沉重的負擔加在勞動群眾身上。因此，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眼光中，精神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嚴重對立，而且前者迫害後者，罪不可逭。毛澤東受馬克思影響，認為知識分子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思想往往是空虛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他又繼承列寧和史達林的觀點，主張改造知識分子，命令他們向體力勞動者學習。及至文革期間，知識分子更名列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務、走資派之後，成為「臭老九」，身心飽受摧殘，民族生命力亦遭嚴重破壞。

鄧小平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時，充當毛澤東的助手。該年十月十九日，他在人民日報發表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明言要用揭露、孤立和分化的方法，「有的還要用懲辦和鎮壓的方法」②，來處置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他同時表示，思想改造是一個長期任務，可能還需要十年以上。無獨有偶，他在一九八七年向自由化宣戰時，又強調鬥爭應該進行「至少二十年」。明瞭以上背景，我們在觀察中共的

現行知識分子政策時，不難感到其來有自；而對大陸知識分子的反撲，也就不覺意外了。

二、中共知識分子政策的近貌

長期以來，中共患有一種「懼恨知識分子症」，過度敏感於知識分子的言行舉止，且報之以知識分子不能忍受的言行舉止。空前浩劫的文革結束後，大陸內部檢討對知識分子的錯誤看法時，概述為以下幾點：1. 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不承認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已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把他們當做資產階級。2. 由此出發，把廣大知識分子要求享有更多當家做主的權利，和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起更大作用的積極性，看成「向黨爭奪領導權」。3. 蔑視科學與文化，宣揚「知識越多越蠢」，否認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知識分子這股力量，似乎只要有工農群眾就夠了。4. 提出「知識分子勞動化」的口號，迫使他們長期從事體力勞動，甚至放棄自己的專業去當工人和農民③。凡此政策，實出自毛澤東的「反智論」。世人皆知，現代文明的特徵之一就是都市化，表現在高效率

的工作和對專業的尊重上。毛澤東不此之圖，反把城市知識分子下放到農村去，這並無助於農村的改良，卻有害於都市的進步，使之成為農村的尾巴，違反了歷史進化的原則。大陸現代化的進度遲緩，與中共錯誤的知識分子政策密切相關。

時序早已進入八十年代，毛澤東的陰影仍未完全消失於神州大地。一九八一年二月和三月，中共中央相繼下達第七號和第九號文件，前者命令作家要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指導下，批判「鼓吹錯誤思潮的作品」，同時必須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無條件地同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不允許發展與中央路線、方針、政策相違背的言論」。後者則授權高級幹部，可以逮捕民主運動人士，扣押地下刊物，對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分子「不能手軟」，一時風聲鶴唳。同年四月，解放軍報即公開批判白樺的劇本「苦戀」，人民日報、北京日報、上海解放日報以至代表中共中央的紅旗雜誌，都加入圍剿的陣營，白樺因此被迫自我批評。九月，他寫了書面檢討，但未獲通過。十月，鄧小平親令批判「苦戀」的文字在文藝報發表，人民日報奉命轉載，白樺終於公開向中共認錯與致謝。鄧小平此舉，令人想起五十年代毛澤東授意下的交心運動，兩者如出一轍，都是共產黨「不殺身體殺靈魂」的傑作。

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共又發動了新整風。鄧小平此時提出思想和文化戰線清除精神污染的問題，正式揭開對知識分子的整肅。中共自稱

近年來造成污染的主因有二，一為封建主義殘餘的影響，二為資本主義的侵蝕，後者尤為其所懼恨，說明中共歷來示警的無效，也暴露外來思想對大陸知識分子的影響。清污運動聲中，穿制服的文化官員紛紛表態，加入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行列。然而鄧小平倡言的四個現代化，必須借重知識分子的智慧與力量，因此中共在整肅大陸思想界與文藝界之際，又恐後遺症的吸收，所以有時就表現出收放兩難的面貌。一九八四年八月，紅旗雜誌就強調「澆花」與「鋤草」兩者缺一不可，因為鮮花與雜草間的矛盾鬥爭此消彼長^④。該誌繼而宣稱，要做到毛澤東的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其實，三不主義與雙百政策——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皆可謂毛澤東的「陽謀」，中共近又以此為號召，欲掩大陸知識分子猶新的記憶，其誠意令人懷疑。

共產主義本為一種意識型態，文藝則為所有意識型態中最引人入勝的一環。正因如此，中共特重文藝，後者成為政治的寒暑表，中共的知識分子政策也就以文藝政策為代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國作家協會」舉行第四次大會，代表中共中央的人民日報評論員發表祝詞，除重申三不主義外，又謂「對於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侵蝕，封建主義思想的遺毒也要加以抵制」^⑤，與清污運動的內容全同，胡啓立也在會中言念及此，並引述了史達林的名言：「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與

其說是對作家的稱頌，不如說是訓令。中外共產黨人都深感要改造世界，必先改造人心，作家就須執行這項洗腦的任務，而其本身當然要先接受洗腦。

為了安撫人心，胡啓立承認中共對文藝的領導有如下缺點：1. 存在著「左」的傾向，長期以來干涉太多，帽子太多，行政命令也太多。2. 派了一些幹部到文藝部門和單位去，有的不太懂文藝，這也影響了共產黨和作家、文藝工作者的關係。3. 作家之間，文藝工作者之間，包括黨員之間，黨員和非黨員之間，地區之間，相互關係不夠正常，過分敏感，彼此議論和指責太多。解決之道，是要改善和加強共產黨對文藝事業的領導^⑥。此說證明中共不想放鬆控制，減輕大陸作家所受的壓力，也無視老演員趙丹的遺言：「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胡啓立一面承認干涉太多是缺點，一面又誓言要加強領導，此種矛盾可謂立即和明顯。一九八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作協」召開工作會議，王蒙以常務副主席的身分告訴作家們，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樹立革命的世界觀，深入火熱的鬥爭生活，了解共產黨事業的根本利益等，他還為胡啓立的大會講話作註，即官方所提創作自由是有要求的^⑦。在中共的「要求」下，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和「我的日記」，王培公編劇、王貴導演的「WM」，先後遭到封殺。事實證明，在鄧小平的統治下，作家依然無法安枕，不願在毛澤東陰影下生活的遇羅錦，當然就會適時求去了。

大陸的知識分子中，以大學生為數最衆，不少人繼承了五四運動的傳統，心心念念在喚起民衆，躋中國於自由平等、富強康樂之境。他們深知欲達此目的，首須外爭主權，內除國賊；次須實行民主，發展科學，數十年來已成爲共識。「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違反民主的政權，既不以民意爲基礎，則人民非其資產，知識分子尤屬債主了。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九日，安徽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爆發了學潮，迅即蔓延大陸各地，規模之大，爲中共建立政權以來所僅見。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免除科大副校長方勵之的職務，罪名是「在不同場合散布了許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言論，背離了四項基本原則」，以及「企圖擺脫黨的領導和背離社會主義道路的辦學思想，給中國科技大學帶來極惡劣的影響，這些錯誤思想在這次科大學生的鬧事中充分暴露出來」。四項基本原則中共的「國策」，背離者可謂罪孽深重。一月十七日，中共開除了方勵之的黨籍，將「新二九運動」強行收場，也換來舉世的譴責。

此次學潮的共同口號是「要民主」和「要自由」，上海交通大學並質問中共統治的基礎，同濟大學呼籲打倒官僚主義，南京地區的學生要求打倒專制，天津南開大學建議效法菲律賓人民推翻馬可仕的起義，北京大學更指斥中共領袖爲暴君，中共政權「在每一方面都與我們過往最暴虐的封建君主制度一樣」⑧。如此

激烈的言論，較五四運動不遑多讓。總計一個月內，至少有一百五十所大學加入示威，大陸除西藏、青海等少數省外，均有官員通報學潮的消息。中共惶恐之餘，在上海、南京、北京、蕪湖、武漢、青島、太原、天津和四川各省市展開逮捕行動，對象包括大學生、留學生、知識青年、工人和反共人士等，鄧小平且下令清算自由化的「頭面人物」，作家王若望與劉賓雁也被中共開除黨籍，益證方勵之事件並非特例。

王若望與劉賓雁在大陸上合稱「南王北劉」，都在十九歲加入共產黨，以青年的激情，狂熱獻身，萬死不辭。及至中年，中共已由在野轉爲執政，真貌逐漸顯露，他們乃基於對黨的忠誠，發表勸諫之作，結果三十餘年來，分別爲毛澤東、四人幫與鄧小平所恨，視彼等的忠誠爲反骨，欲除之而後快。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三日，上海市紀律檢查委員會開除王若望的黨籍後，中共即展開圍剿，人民日報、解放日報等都加入戰陣，說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尤其否定兩個核心，也就是主張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主張多黨政治，反對共產黨領導，公然背叛與發賣黨綱、黨章與黨紀⑨，也印證了鄧小平的聲明：「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對黨的領導⑩。」依中共之意，王若望不是一時糊塗失言，也不是在某些問題上認識不清，而是長期全面的反黨。因此，鄧小平和毛澤東、四人幫一樣忍無可忍，率領劣幣驅逐了良幣，理所當然地把王若望

清除出黨，中共黨內也就更見劣幣充斥了。

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劉賓雁繼王若望之後被開除黨籍，中共就稱兩人是文藝界的腫癌，而且業已割除。此語頗似出自反右和文革時期，鄧小平也就有些貌似毛澤東和四人幫了。人民日報紀律檢查委員會指出，劉賓雁攻擊四項基本原則是「陳腐的，曾經把中國幾次引向災難的過時觀念，僵硬的、教條主義的東西，詞句很好，內容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動的」，馬克思主義是「過時的意識型態」，他寫「人妖之間」與「千秋功罪」，都是爲了展示一個真理，即中國共產黨的腐敗⑪。中共公布上述罪狀，徒然換來世人對劉賓雁的尊敬，並使我們想起盧那查爾斯基的劇本「解放了的唐吉訶德」，它敘述塞凡提斯創造的這位老武士，曾奮力協助所謂革命派，可是解放後，他又反對這群爲目的不擇手段的人：「我預先告訴你們：我只要看見有被壓迫者，凡是被你們壓迫的，就算是用一種新的正義名目來壓迫的，那我一定要幫助他們，就像以前幫助過你們一樣。」劉賓雁和王若望就像瞿秋白譯介的此劇主人翁，扮演「我贊成你們，也反對你們」的不屈角色，爲中國知識分子樹立了典範。

方勵之、王若望和劉賓雁事件既揭，海外輿論固不利於中共，大陸民心亦傾向此三人，趙紫陽爲減輕後遺症，曾表示不會有知識分子再遭整肅。言猶在耳，一九八七年八月，中共又先後整肅了吳祖光、王若水等人，可謂自毀承諾。論者或謂吳祖光是被胡喬木逼令退黨的

，似與鄧小平無涉。此說直視鄧小平如無物，也昧於中共政治的實情。「十三大」結束後，趙紫陽即在記者會上表示，現在中共的領導人裏，智慧和政治經驗無人比得上鄧小平。「遇到重大的問題，向他請教，我就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一些，何樂而不為呢？」鄧小平的政治經驗非胡喬木所能及，權力尤在胡之上，則豈能與吳祖光等事件無關？誠然，鄧小平不似毛澤東身兼中共的列寧和史達林，因此有其權力的極限，不能與毛澤東等量齊觀，但他從反右以來，整肅知識分子的紀錄確已令人目不暇給，實無法規避其責任。我們不必懷疑鄧小平在中共黨內的強人地位，值得重視的是，中共黨內不乏離心的知識分子，他們稟於良知和勇氣，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讓苦難有出聲的機會，是一切真理的條件」，阿德諾（J. W. Adorno）如是說。準此以觀，中共扼殺了這個條件，真理也就與中共拉長了距離。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共召開「十三大」，趙紫陽在會上的報告堪稱冗長，論及知識分子政策的部分則甚簡短，主要強調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應逐年增加教育經費，堅持教育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方針。「必須進一步造成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社會環境，繼續改善知識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努力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要充分發揮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對一切為現代化建設作出優異成績的人們都要給予獎勵」^⑬。中共應允尊重知識分子，不自「十

三大」始，從一九七八年三月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會議」的講話，到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憲法」，都有類似的論調，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會議的樂觀氣氛也不等於實際的成功。一九七九年以來，我們看到了魏京生事件、白樺事件、方勵之事件、王若望事件、劉賓雁事件、劉心武事件、吳祖光事件等，也看到了穿插其間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凡此種種，鄧小平幾乎無役不與，不少西方人士卻始終視若無睹，以駭鳥之姿，在沙灘上想像一個英雄的鄧小平，如同當年想像一個英雄的毛澤東。

然而大陸知識分子仍須真實過活，無所假借，也無所遁逃。魯迅甘為孺子牛，所以自謂吃的是草，擠的是奶；今日大陸知識分子則被迫為牛，而且往往擠的是血。方勵之即指出，大陸教師的待遇為世界倒數第二名，僅高於柬埔寨；教育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之比亦為倒數第二名，僅勝過海地。柬埔寨為東半球的赤貧國，海地為西半球的最貧國，相形之下，歷代以尊師為尚的中國大陸，如今卻與彼等為鄰，堪稱一大悲哀。大陸知識分子的慘況尚不止此，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光明日報披露各處中年知識分子早逝的消息，其中「北京航空學院」七個月內死去七人，「中國科學院」四個月內也死去七人，單就北平一地統計，兩年來早逝者即達四三四人，死亡率遠高於同期的職工。「中華醫學會」對北平十一個單位調查，發現中年科技人員患慢性病患者高達百分之八十

一點六，「國家科委會」對三萬七千人調查，慢性病患者也達百分之六十一點六。另據一九八三年的調查，中年知識分子的死亡率是老人的兩倍多，近年則有增無已^⑭。「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孟子兩千多年前的描述，如今都到眼前來，此為中華民族的莫大損失，而知識分子救死惟恐不及，無法全力投入現代化建設，這又是誰的損失呢？必使大陸知識分子「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這樣一個千古不易的課題，已成爲中共「十三大」後的當務之急。

三、大陸知識分子的反撲

依中共的統計，大陸現有知識分子一千五百多萬人^⑮。此距實際需要仍嫌不足，趙紫陽因而在「十三大」發出懷柔之聲，直盼知識分子都爲其所用，替中共完成四個現代化，至於許多知識分子追求的民主制，則期期以爲不可，且必除之方能安枕，此已彰彰在世人耳目。大陸知識分子既關懷國事，因「中國往何處去」的看法與中共有異，起而抗爭者亦所在多有，成爲衆人仰望的夜星。

方勵之顯然服膺培根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他呼籲大陸知識分子挺起脊梁做人，不要唯上是從，應該自我貴重，一旦如此，力量即出。同時，大學必須是思想中心，要醞釀自由民主的空氣，培養愛好真理的意識，轉變高等教育的方向，使知識分子成爲社會進步的主導。此種蔡元培式的「民主辦學」構想，一

度獲得中共稱許，後又猛遭批鬥，其反覆無常可見。民主與人權的定義不止一端，方勵之的觀點接近盧梭，而時代性過之。他確信民主本身的含義，首先就是人人有自己的權利，然後組成社會，所以不是上面給的，是與生俱來的。人權在大陸非常陌生，其實此說不足為奇，即人類天生具有生存、生活、婚姻、思想、受教育等權，一如自由、平等、博愛，是自然資源，也是歷史遺產，肯定值得爭取，這才是真正的民主。由此可知，民主與人權密不可分，是天賦的，非恩賜的，但中共既已退化到黑暗時代，盧梭式的言論自如洪水猛獸。抑有甚者，方勵之公開反對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科學研究，「所謂指導總是做出錯誤的結果，從來沒有正確的成果。解放以來，所有的學術批判，沒有一次是正確的，百分之百的錯」。談到好好學習，原為學生的份內事，「但是說這一機會是黨和國家給你的，是完全錯誤的」。至於深圳青年報請鄧小平退休，他認為是很自然的現象，「我覺得這當然是大家表示的意思，是可以的」^{①⑥}。凡此言論，在中共看來可謂大逆不道。方勵之正如魏京生，鳴鼓而攻的對象，上自馬克思，下至鄧小平，後者既有逮捕魏京生的經驗，整肅方勵之實屬必然。

劉賓雁復出後不改其志，主張以文學為媒，行不平之鳴，強調真實之必要，並以關懷民間疾苦為己任。由於大陸文壇受到中共的壓制，使得反映現實生活的作品日少，粉飾太平的文詞日多，他深為此憂，所以和魯迅一樣，矢

志寫不瞞不騙的文章。他雖然身為人民日報記者，卻直言大陸報紙「還不成為真正的報紙」^{①⑦}，原因就是中共以蘇聯為師，時常以為刊登光明的消息就能造成良好效果，他自己寫作則着重揭露事件，並探討何以發生，讓讀者理解社會受到破壞，許多地方需要改造。大陸流行「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之說，他聯想起創作自由也是同理，既然有了七分自由，為什麼捨不得用，只肯花掉三分？「它和錢不同，有點像空氣，儲蓄也白搭。自由這東西，與許還越用越多呢」^{①⑧}。此說頗異於中共的清規戒律，舉一九八五年的「作協」新章程為例，與「保證創作自由」列於同條的，就是要在中共領導下，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指導，顯露了陷阱與矛盾。劉賓雁絕口不提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以人類不可或缺的空氣比之創作自由，在中共看來，自屬離經叛道。

王若望一如劉賓雁，以筆為鼓，替人鳴冤。他復出後至少已撰文兩百餘篇，其中多為雜文與文藝評論。大陸文藝界說他是未來學的預言家，因為從一九八〇年起，每年春季總要刮出一道冷風，為王若望所不幸言中。「我何嘗樂意每年刮冷風！但願今後永遠摘去這頂倒霉的桂冠。但是事實是：因為春寒料峭，各個凍得噤若寒蟬」^{①⑨}。他才出此語，不久又不幸言中，而且首當其衝。一九八六年底，他對海外記者指出，大陸的政治經濟體制過於中央集權，大小事務都不向人民公開，選舉制度也欠缺民主。同時，他向知識界廣發信函，建議在一九八

七年二月，召開百花齊放政策三十周年紀念大會，凡此更引起中共的忌恨，胡啓立就指他「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煽動擴大言論自由」^{②①}，此與扣帽子又有何異？中共開除王若望的黨籍後，歷數其三大罪狀，最能說明這位老作家的風骨：1. 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指為空洞無物的幻想，「實質是封建的、半封建的」。他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大陸迫切需要的，應「回過頭來再補課」。2. 否定共產黨的領導，認為共產黨就是喜歡權力鬥爭，書記什麼也不懂，「靠整人吃飯」。他更不贊成黨領導文藝，主張創作自由和看戲自由。3. 反對共產黨的政

策，認為粉碎四人幫後，文化和思想的基礎並未改變，對「左」的一套紋風不動。他說清除精神污染是一場沒有標簽的政治運動，從事改革的人「大部分被打下來了」，又為資產自由化辯護，「我就是要自由化，不給我自由，我就要鬥」，並鼓勵青年和大學生「跟著自由化走」。凡此大氣磅礴的言論，使王若望和方勵之、劉賓雁贏得「新三家村」的雅號。

大陸知識分子對中共體制與政策的反撲，可以此三人為代表，但不可以此三人為限。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國之春」雜誌披露了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兩份密件，一為「若干言論對照」，一為「關於若干理論問題的一些材料」，全是大陸各地知識分子的言論摘要。他們或謂「四個堅持首先是中國意識型態的牢籠」；或謂「共產黨在四項基本原則的借口下，把社會生活各方面的權力都抓在手裏，其實他們什

麼都做不好」；或謂「醜陋的馬克思主義是十九世紀資本主義時代的產物，過時了，不適合中國的國情」；或謂「打倒萬惡的共產黨！」或謂「如果有一天，國民黨來大陸競選執政，我將投它一票！」或謂「結束專制統治，取消黨委領導，黨員退出學生會組織」；或謂「共產主義是美好的童話」；或謂「放眼世界，民主進程不可逆轉，一條三八線，一堵柏林牆，一道台灣海峽，觀其現代化進程之差異，國人不得不反思」；或謂「社會主義國家犯錯誤不是偶然的，根本問題是體制問題，所以導致中國大陸趕不上台灣，蘇聯趕不上美國，民主德國趕不上聯邦德國，北朝鮮趕不上南朝鮮」；或謂「三十七年殘酷的現實使億萬人美好的願望完全破滅了」；或謂「社會主義民主，自欺欺人！」或謂「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的政治一直都是中國的封建意識加斯大林的獨裁主義的政治」^{②①}。凡此不勝枚舉的言論，中共原為整肅知識分子而收集，如今公諸於世，證明了大陸是一堆乾柴，也是一座火藥庫，只需要一點火種，就可能掀起燎原之勢，震撼那封建的政權。

的確，五四運動以來的史實顯示，知識分子每為全體國民的先鋒，他們身無半敵而心憂天下，手無寸鐵而不畏豪強，如能喚起民衆，不難扭轉乾坤。這股力量似微而巨，拂逆者往往由盛而衰，甚至付出政權為代價，這是何等驚人！昔日「三家村」之一的鄧拓，曾經如此歌唱太湖：「東林講學繼龜山，事事關心天地

間，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由是觀之，大陸知識分子的反撲，將成為中共的終極之患。

註 釋

- ① 胡秋原：「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分子」，台北學術出版社，民國六十七年十月台四版，第八頁。
- ② 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擴大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九日。
- ③ 吳克：「『左』傾錯誤與知識分子的遭遇」，原載「新時期」，一九八一年第二期。香港「爭鳴」月刊轉載，一九八一年七月，四八頁。
- ④ 高占祥：「開一代文藝評論新風」，紅旗半月刊，一九八四年第十六期，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六日，一五頁。
- ⑤ 本報評論員：「大鼓勵，大團結，大繁榮——祝賀全國作協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召開」，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 ⑥ 胡啓立：「在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 ⑦ 「王蒙在中國作協工作會議上說：在堅持創作自由的同时須強調作家的社會責任」，人民日報，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六日。
- ⑧ 陳力生等編著：「野火春風——中國大陸一九八六年學生民主運動紀實」，台北中國大陸雜誌社，民國七十六年五月出版，一〇六頁。
- ⑨ 席于生：「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為黨紀所不容——批判王若望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言論」，解放日報，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
- ⑩ 引自張振陸：「從王若望的言論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實質」，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日。
- ⑪ 「中共人民日報社機關紀委開除劉賓雁黨籍」，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 ⑫ 中華戰略學會大陸研究會編印：「匪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專輯」，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一四五頁。
- ⑬ 趙紫陽：「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收入中華戰略學會大陸研究會編印：「匪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專輯」，同註⑫，八七頁。
- ⑭ 「本報召開中年知識分子問題座談會」，光明日報，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
- ⑮ 劉銳紹：「知識分子面對五大難題」，香港文匯報，一九八七年十月三十日。
- ⑯ 方勵之：「現在是誰也不怕誰」（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五日在上海交通大學的演講），收入方勵之：「我們正在寫歷史——方勵之自選集」，台北經濟與生活出版公司，一九八七年九月第一版，二〇一頁。

⑰「劉賓雁語錄」，香港明報，一九八五年十月四日。

⑱劉賓雁：「我的自傳」，收入劉賓雁：「論文學與生活」附錄，人民文學出版社。引自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二〇一期，一九八六年

十月，八一頁。

⑲關愚謙：「王若望談文藝政策及改革」，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一九九期，一九八六年八月，七九頁。

⑳林同：「王若望發信串連知識界」，香港明

報，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七日。

㉑詳見中共中央書記處密件之一：「若干言論對照」及密件之二：「關於若干理論問題的一些材料」，收入「中國之春」總五十四期，一九八七年十一月號增刊，一四一五八頁。

大學叢書

預力混凝土結構設計

林同棧等著
盧堅譯

售價二七四元（含稅）

預力混凝土為有效、經濟之現代化結構物，具有造價低、抗蝕、耐火諸優點，極有利大型工程之建設，本書係根據原著第三次修正本，內容更見精闢周詳，除以解析與試驗成果互證外，並提供設計題材，為歐美各國所重視與樂用。

大學叢書

微分方程

趙良五
陳冒海合編
林福來

售價一三二元（含稅）

今日科學進步甚速，微分方程之應用亦隨之廣泛。本書主要係介紹常微方程式之基本理論，兼及實用性，並簡單介紹偏微方程式的基本知識。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